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老師：魏百谷 助理教授

非營利部門在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發展之
比較研究

**The Development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and Russi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研究生：衛大力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致謝詞

能為這部論文順利地畫下句點，是對我人生中學術研究的春天，一種美好時光的奉獻。這四年一路走來，要感謝的人真的太多！

首先，承蒙我的恩師 - 魏百谷老師的指導，指導我這整部論文的撰寫過程以及完成修改等扶持。魏老師的指導不但讓我忘記了中文有多難，還替我增加了對故鄉 - 俄羅斯更深一步的了解，使得我研究的經驗變得更加令人珍惜。我還要感謝論文的兩位考試委員：王信賢老師和林永芳老師。在本研究的初期，兩位老師寶貴的建議，就替我架構出整個研究過程未來的方向。隨後，在口試的那一刻，兩位老師仍能不厭其煩地，替我提出許多珍貴的批評和修改關鍵。有了三位恩師的建議及指導，讓此一跨國比較研究，才能順利地帶來其研究的成果。

身為一個俄羅斯人，在使用中文所撰寫的論文過程中，我無法避免來自語言隔閡的障礙，但是，我有一群像家人般的台灣和泰雅族親朋好友的支持，無論刮風打雨，他們總是替我撐腰。有了他們這樣奮不顧身的幫忙(有時還因為要如何替我校稿而想破頭)，我才不怕中文的學問經深，繼續勇往直前。

最後要感謝的是，東亞所的每位老師和同學，以及整個東亞所的恩人 - 張惠梅助教。你們用台灣人才有的熱情和友誼，替我找到繼續往前衝的理由。

我也感謝台灣這一塊土地，因為只有到台灣之後，我學衛生涯的第一個夢想才能夠成真。台灣，替我實現了夢想。

最後(真的是最後了)，感謝關心我、幫助過我的人，以及我最深愛卻遠在北國俄羅斯的家人，謝謝你們，有你們熟悉的俄文問候和關心，讓我才能勇敢的築夢踏實。

衛大力 敬上 2011/9

摘要

本文根據中國 1980 至 2008 年之前的發展以及俄羅斯 1990 至 2005 年的發展得到如下研究成果：兩國制度環境不一而發展階段不一。本文認為，俄羅斯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傾向未定型，已經不屬於「進口導向的模式」，但還沒有變成「本土化發展的模式」，而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模式比較傾向於「本土化發展的模式」。

使用俄羅斯和中國比較途徑，本文試圖釐清影響非營利部門發展因素的問題。這個途徑的優勢在於穩定的可比性：兩個處於轉型時期的後極權主義的社會提供完整的比較框架，從研究方法來分析，這種途徑屬於同中求異的研究方法。

在俄羅斯非營利部門漸進地發展以及「合法化」過程的起點，可以回溯至 1980 年代中期合作社以及其他種類的社會組織的建立，和 1990 年代初期的全面開放，到了 2002 年有 0.8% 經濟活動人口從中獲得就業機會。而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大陸單位制的轉型產生了大量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自願組織，代替了原本屬於政府體系的龐大部門。如有研究指出，到 2002 年中國非政府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將近 300 萬，比起金融等相關行業的就業規模還要大。但與此同時，這些組織所佔的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為 0.36%，與工業和服務業相比是中國最低的由此可知，中國大陸和俄羅斯非營利部門規模之近，但是這些籠統的數據背後有著不同的實質發展過程以及結構特質。

本研究的宗旨為釐清制度環境對社會非營利部門的影響。筆者對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社會組織的制度環境進行對照之後，推論出有助於釐清非營利部門發展因素為何。本文以「非營利組織」為研究對象，試圖找出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社會發展的比較基礎。跨國比較研究需要為了自變項和依變項找出詳細並且有包容度的操作定義，才能夠順利地完成之。

關鍵字：非營利組織，第三部門，公民社會，社會轉型，跨國比較